

樂山文史資料
教育專輯

第六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樂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23.16

乐山文史资料

第六辑

教育专輯

YH206/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耕耘教育五十年	杜厚春 (1)
马一浮先生与复性书院	遍 能 (18)
春蚕到死丝方尽	廖幼平 (22)
云山苍苍永难忘	张正屏 (36)
记我在峨眉山川大复学的斗争	张 宣 (43)
省乐师史实漫述	刘君照 (61)
抗日战争中的省乐中	蒋仲达 王世臣 (78)
波澜起伏的省乐中	雷应澜 (94)
省乐中迁夹江的经过	黎玉冰 (104)
后起之秀的乐嘉中学	唐叔庆 (107)
眉山国民师范学校回忆	宁澈澄 (121)
五十年代前期的眉山中学	彭泽良 (124)
1941：我在马边中学的第一年	李伏伽 (128)
峨边中学创办前后	杨文志 吴有清 (175)
峨边县兴办民族小学简况	吴有清 (179)
仁寿县私立文华初级中学简介	徐忠稷 (183)
五通桥中学的前身——私立通材中学记	赵本钧 林云阁 (190)
回忆筹办震华中学的经过	李从周 (194)
犍为知行中学与其奠基人叶绪禹	杨德超 帅华光 (202)
丹棱集资办学纪实	万天星 (205)
校工生活回忆	朱伯璋 (208)

耕耘教育五十年

——乐山教育界一代师表杜高崇先生事略

杜厚春

一、前言

先父杜高崇先生，字峻森，生于一八九二年一月（清光绪辛卯十七年腊月初四日），世居乐山市城内北门桂花楼。

先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家乡教育工作，全心全意为乐山培育人材，任教班级一百二十多个，学生达六千余人。由于高年衰竭，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时五分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七岁。

病重期间，乐山市委、市府领导，市人大、市教育局及乐山一中领导同志，亲往病榻看望、慰问。乐山市人民医院院长，亲率医疗小组，来家尽力抢救。

一月二十八日，在乐山剧场隆重举行追悼仪式，参加悼念活动的共三百余人，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关怀。

二、先生的青少年时代

曾祖父杜斗山与祖父辈共同经营高北门正顺号米铺，祖父杜立斋担任北门公正（街道公事调解人，无工资），养育父辈兄弟姊妹八人，先生行二，家庭生活负担很重。

先生七岁发蒙读书。家里延请青神杨济川老师为塾师。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希望能考上秀才、举人、进士，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先生少年时，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嘉奖。

一九〇三年九月，乐山举行县的童生考试，时先生年十二

岁，由家里在县衙门礼房报名参加县考，考场是现在乐山公园（人民文化宫），考场由“承差”监考。第一场的考试题是“乐其道而忘人事”，还有一场是“商贾皆悦藏于市”。共考五场，每场考完发榜，有名才能进入下场考试。开始有一千多人参加，连续五天，结束时，只剩五六十人了。终场考生每人缴二百钱在考场聚餐，先生是考终了场的，照例缴二百钱参加聚餐。一九〇三年十月底，嘉定府考试，各县的考生参加，先生顺利通过了前两场考试，第三场无名字，以后没有参加。接着一九〇四年，清政府下诏废科举，办新学，次年乐山有了第一所官立小学。

光绪末年，朝政腐败，内外交困，闭关锁国的政策，早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变法维新，又告失败。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办学堂。当时，乐山知县李韵琴决定筹建官立草堂寺小学（地址现草堂高中），次年，小学校舍修好，开始招生。

废科举后，很多寄希望于功名的人，都把注意力转向新建的官立草堂寺小学。那时的人认为小学毕业，就相当于秀才，所以报考的人有一二百，入学考试，仍设在考场，张榜后，郭沫若先生（当时叫郭开贞）名列二十七，先生列二十八，大伯父杜高炯，名列四十五，共录取八、九十人。考试揭晓后，给家里既带来欢乐，也带来忧虑，因为，小学学费要交五元，伙食费每月二元，加上书籍笔墨费，每人一期要银元二十元，弟兄二人，每期要花费四十元，小米生意，负担不起。曾祖父思前想后，终于决定：大伯父杜高炯读书，先生则继承祖业，去经商学生意。先生十三岁即被送到竹根滩后河街一家商号当徒弟。到竹根滩后，才知道当徒弟的艰难，分明是侍奉掌柜（老板），心里很不痛快，住了半月，就装病被接回乐山。祖父提出，家里尽量省吃俭用，还是送去上学，到草堂寺小学报名时，已迟到一个多月。第二

年，进校后，又分为两个班，一班是甲班，一班是中学预备班，大伯父杜高炳和郭老编入中学预备班，父亲分到小学甲班。

当时这批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大的二、三十岁，小的十三、四岁，先生和郭老都是最小的。开始时校长是陈济民先生，后来陈因出任国文课，校长职务交给了易曙辉（晴窗）先生。易校长是副榜出身，教“乡土志”，讲课极生动，能写一手好行书，郭老所著《少年时代》中说的“易老虎”，就是说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格，有时不免暴躁，大家都怕他。

小学开设了国文、经学、历史、地理、数学、生物、修身、图画、音乐、体操等科。国文是陈济民先生担任，他是举人，选《古文观止》作教材，教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极富感情。经学、图画、音乐是帅平均（镇华）先生，帅先生是著名经学家，并研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的弟子，官费留日学生。他上经学课，时时在学生面前流露出对“吾师廖并研”的崇敬。历史、地理是刘书林先生，什邡人，成都高等学堂毕业，是教师中唯一的外县人，性情温和，对提问学生的态度极好，那时只教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教材是刘先生自编自讲，历史从唐虞夏商周讲起，地理则讲中国十八行省。数学是杜少裳先生，也是日本留学生，杜先生人瘦，很机敏，善辩，遇上什么事情，脑瓜子一转准有“点子”。郭老说他绰号“水晶猴子”就由此来。生物教师是王祚堂先生，四川高等学堂毕业，他自编教材，讲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清末学生，只接触过“四书五经”，几时听过这些课，所以很感兴趣。教体操是黄云章先生。另有一门叫“修身”，讲个人道德修养和对人处世的礼节。修身课也是没有教材，教师讲孔子、孟子、朱熹的言行，以启发学生怎样去做人。

每班除了上课的老师外，还专门设有“监学”（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管理学生的学习、生活、纪律，当时中学预备班的监学叫王筱安，牟子场人；小学甲班的监学是陈良伯，住九龙

巷，他们都是廪生。尽管两位监学压阵，学生里的“自由活动”还是不少的。

在小学期间，先生和郭沫若、吴尚之、张宅安（郭老著作中的张伯安）、杨鲁玉，年龄接近，性情相投，要得很好。当时由于学习紧张，伙食单调，有时外出“改善生活”。乐山是嘉定府所在地，商业繁荣，好吃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是处于学生时代，经济有限。他们经常去学道街“双和园”吃杂酱面，有时去价廉物美的凌云门（今乐山港）外的三江饭店吃豆花饭。

每年寒暑假，学生们纷纷返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加上家庭管得极严，先生又喜欢读书，于是利用暑假，一口气看完了《了凡纲鉴》。

乐山县官立小学堂开办不久，一九〇七年，嘉定府也办起一所“嘉定府官立中学堂”，先生又开始了中学生活。

官立中学堂开办，起先是由嘉定知府杜本崇呈请上峰委任乐山王兆涵（镜湖）为监督（即校长），招收第一班（甲班）共二百余入，学生在七县招收（乐山、峨眉、洪雅、夹江、犍为、荣县、威远），分为四班，校址在道门口，即以前考棚内。除教员院系旧有房屋改建外，其余均属新建，经费由嘉属七县负担，全年约三万余两，图书以九峰书院旧有书籍为最多。开学仅一月，王兆涵辞职赴省，而杜本崇知府调任他处，改由新任知府福润代理监督。

先生有机会考上中学，又有缘和郭老成为中学的同班同学。那是因为嘉定府考中学生时，中学预备班只有三十多人，当时大县取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乐山是大县，不够名额，所以把县小甲班中成绩好的，经过考试，选送了六名参加考试，有先生及徐鸿烈（阳武）、游辅国（子久）、姚荣熹（省三）、胡养卿、徐东平五位前辈先生。

中学堂开办时，共二百多人，分为甲一、甲二、甲三、甲四

四个班，有教室、寝室、自习室等，学校规定五年毕业，开设课程有：经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日语、体育、图画、音乐等，教师多系四川高等学堂毕业，管教认真，教经学是谢碧岑老师，历史是刘星南老师，地理詹桂村老师，英语杨少奇老师，日语魏文通老师，数学是峨眉人（姓名不详）。

刚开办的五年中，更换了五个校长，最初是王兆涵，其次是秦昌绪（王基健为人）、严道尊（洪雅人）、王志仁（怀宣乐山人）、傅泌（乐之洪雅人）。当时只有一所中学，每年招生一班，以后班级称乙、丙、丁、戊、己、庚班，（据说因“庚班”与“跟班”音混，不是雅称，）继后才改成一、二、三、四、五、六、七班。先生在校期间，由于家庭经济相当拮据，自己对学习又很勤奋，星期天都要赶到学校吃饭、自习，（家住桂花楼，离校很近），各科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每期发榜都是第一、二名（一般是帅朝佐第一、杜高崇第二）。

在学习期间，正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对外屈辱投降，丧权失地，学生们对清政府统治极为不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学校只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因此，在中学时代，先生便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

一九一一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它以保路为开端，加速了辛亥革命的步伐，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运动开始于成都，反对铁路收归国有，成立保路同志会，并暗中和学生联系，各校学生纷纷响应，于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整个成都沸腾，浪潮波及全川，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全面展开。当时的乐山，比较闭塞，九月，乐山江面漂流很多布牌，撩起一看，上面写着成都斗争情况，号召各地开展抗粮抗捐，组织同志军等，当时叫它“水电报”，是革命党人号召群众斗争的一种特殊通知。先生见到“水电报”后，在同学中宣传，同学们积

极行动起来，决定成立“嘉定府中学堂保路同志会”，并推举他为同志会副会长，兼理总务工作。他们走上街头宣传，介绍成都活动情况，对闭塞保守的乐山人民，起了鼓动宣传作用。学校也无法上课，部分学生纷纷归里，所有书籍箱笼存放学校。十月，嘉城遭兵变，除将学生箱笼全部抢劫外，学校图书仪器损失一空。

武昌起义，清政府被推翻。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上期，学校校舍完全驻兵，无法开学，学生大部转学成都，嗣经一再交涉，迟至五月，乃将校舍腾出。适值第一班（甲班）已届毕业，学校乃召集该班学生返校，举行毕业考试。毕业后先生即去成都，考入四川高等学堂，由于裁府留县，校名改为嘉定联合县立中学校，学制也由五年改为四年。

民元之后，政局动荡，教育经费至感困难，联中校款更来之不易，当时是由中资捐助（房地产买卖的中人费）勉强解决，每百元抽一元，由劝学所（相当以后的县教育局）所长承办，七县组织一个“维持会”，乐山县长兼会长，校长为副会长，七县视学为委员，每年开会一次，审查学校预决算，大县六成（三十四分之六）、中县五成（三十四分之五），小县四成（三十四分之四），教师来源，一方面由校长聘请，另一方面由各县视学介绍。

先生考入高等学堂，读二类一班（即理科班），大伯父杜高炯考入四川法政学堂，家里负担两个子弟在成都读书，支出十分浩大。先生在学习期间省吃俭用，埋头读书，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毕业。这时很多同学东渡日本留学，先生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放弃这一愿望，回到家乡教学。

三、献身教育事业

（一）嘉属联中的十年。一九一五年，威远人欧阳华（复

山)担任嘉属联中校长，奉令增设师范讲习班，因感经费困难，开学后即辞职，荣县人张鸿仑(信昆)接办。张就职后，锐意改进，整饬学风，增加预算，购置图书，提高教师待遇，学校渐有起色。先生自高等学堂毕业后，即被聘请为该校教师。开始讲授数学、英语，以后专讲三角、几何，学生中有“张三角(宅安)、杜几何、谭代数(峨眉人谭季常)”之称。每月工资三十四吊铜钱(约合银元三十四元)。当时，先生年二十四岁，每月能收入三十多元，对家庭是一大帮助。刚离开学校的先生，朝气蓬勃，兢兢业业，希望将所学知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对乐山教育事业有所贡献。他从第六班起开始上课(六班学生有詹汝言、陈宦湘、熊鸿章、袁子鉴等)。一个年青教师，能在嘉属联中任教，真不容易，如果在教学上稍有马虎，即有被解聘的危险。旧社会教书，既要讲求真才实学，又要有人际关系。嘉属联中从一九〇七年开办，到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七年中，更换了二十一个校长，任期多则二年，一般是一年或半年就换了。校长是省方委任，教师由校长聘请，只聘一期，下期是否继续任教，谁也不知道。粉笔生涯，最无保障，校长和教师，都要到开学时拿到委任或聘书，才能放心。民国时期，在教育界盛传的“六腊之战”，既是讽刺，也包含不尽的辛酸。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荣县张鸿仑复任校长，聘先生担任教务长职务，工作更繁重，五年当中，学校平静，经费由驻军负责提解，办事裕如。

一九二四年，进行学制改革，嘉属联中分初、高两级，原来是四年半业，从第二十三班起，改为初中三年毕业。当时四川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各划势力范围，驻防乐山的是第八师师长陈洪范(福五)，他的师部原驻九峰书院(现月咡塘公安局)，为了扩大范围，借口说联中在城里不适当，应迁到城外去，经校长杨南屏(易恒)多方说情，才由陈洪范答应在内税项下拨款三万

元，另觅校址新建校舍，（今乐山一中校址）。九月唐节敷任校长，因校舍未完工，复请刘文辉帮办，拨款一万元，完成校舍围墙及校门。

（二）接任教育局长开办乐山县男女中。一九二六年四月，家父接任乐山县教育局局长职务，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二年多是乐山中小学的发展时期。一九二六年下期，为了改革学制，省教育厅厅长万克明，召集全川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到成都开会，要嘉属联中只办高中，不办初中，初中由各县自办。因此联中于一九二七年停办初中，高中办文科一、二班，师范班，以后又称普一班、普二班。当时，先生以乐山教育局长身分参加了会议，考虑到联中不办初中，小学毕业学生去哪里升学，联中的学生来源，又如何供应呢？因此，回乐以后，便积极主张筹建一个初级中学，邀请地方士绅开会，成立董事会。商量结果，大家表示赞成，校址选定在桂华寺（现高北门军分区），经费问题，由教育局召集各乡团和士绅开会，决定在粮税内附加，每两条粮附加一元，乐山地方有八千多两条粮，收入可靠。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就正式成立了乐山县立男子初级中学（现乐山六中），招收第一班，我的叔父杜高厚（道生）便是第一班学生。

乐山草堂寺小学当时只收男生，除基督教办进德女子小学外，还没有女校。龚旭东老先生极力要求教育局开办女子学校，经过筹备，在鼓楼街三元巷子办女子小学（现军分区），俗称三元巷子小学。从此，乐山妇女才有了进校读书的机会。就在这个时期，各乡镇士绅，纷纷要求教育局同意在各乡开办小学，先生为了发展地方教育，都积极支持。通江乡的王建模办嘉乐小学（当时称嘉乐乡），安谷刘钊办安谷小学，苏稽办怀苏小学。每乡开办时，父亲都亲身参加。办学风气如雨后春笋，各乡都先后开办了学校。（按民国二十三年印行之《乐山县志》卷五建置志，城区学校目表列十分详明。足见筹办工作擘画精审，仔细郑重，历

史资料，值得珍视）。

女子小学成立后，女生逐渐增多，女学生小学毕业后，有钱的家庭就到成都升中学，没钱的就只有失学。不少人对先生谈，男子读书有中学，女子升学就无人管，先生认为意见正确，应该解决，但校址经费又无着落。适逢这时先生正准备交卸教育局长职务，于是把筹建县女中事向继任局长杜国清（镜如）作了交待，要他积极筹备。此后，乐山在成都的同乡会人士热情建议：提出办校经费和地点、把“教养工厂”（即无业游民学工艺的地方，当时叫“总爷衙门”，即现在的县街小学）停办，将其地址和经费拿来办女中。筹办三个班，需要八千元，又在粮税上附加五角，共计一元五角，县男中一元，女中五角。在成都立案后，一九二九，乐山县立女子中学校，便正式成立，每年招一班，（郭淑华就是第一班学生），女中校长暂由县男中校长帅蕴德兼任。那时教师的待遇，没有联中好，但每月都能按时拿到薪水，所以很多教师，都愿意在县男女中任教。一九二八年，先生辞去教育局长职务后，挂少陵老辈（也是他小学时的老师），曾邀约他去成都工作，但被婉言推辞，仍回母校联中任教。当时有人劝他说：“你当了婆婆又来当媳妇？”先生却一笑置之，他们哪能理解他终身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在联中一直教到一九三一年底，才接任乐山县男中校长。

（三）县男、女中校长。一九三二年上期，先生接任县男中校长，在三年半的任期内，首先是扩充班次，增加学生入学机会。学校开办时，每年招收一班，以后逐步改为每期招生，学生人数由一百五十多人，扩大到三百多人。其次是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在县男中任教的，都是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教师；沙湾陈学熙任教务主任，夹江王泽霖任训育主任，龚旭东、邓绍儒、刘谦清、龚甫凤任国文教师，戴俊卿、周道明等任数学教师，杜履中任历史教师，陈学熙、胡养清任地理教师，杜绍儒任动植物教

师、乐以巍任生理卫生教师，郭宗璠任音乐、图画教师，李志竟任公民教师，钟肇先、罗玉涵任英语教师，尹道任任体育教师，雷天声任童军教练，袁仲权、龚庸风任国文外还兼级任教师。

县男中在这几年里，办出了成绩，对外声誉颇高，乐山附近的夹江、犍为、五通、峨眉等都有不少学生来校读书。县男中还制订了“整、恒、诚、朴、和、乐、仁、勇”八个字的校训，还在青色制帽上戴有金光闪闪的“乐中”二字校徽，当时的年青人都以戴上这两个字的校徽为荣。一九三四年，县男中出版了乐山办学以来的第一本“校刊”，内容详细介绍了学校情况和师生们撰写的文章，我记得郭宗璠先生写了一篇《宗洵之死》和学生写的《食堂上的悲剧》。这在军阀割据、文化闭塞的乐山，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一九三五年交卸县男中，次年春，地方人士又保荐先生出任县女中校长。在县女中的三年半校长任内，仍然是扩大班次，从每年一班，改为每期招收一班。其次是育贤街原女中校地已不能发展，适逢县男中迁北门外关爷庙和张爷庙（现乐山一职中），才将女中迁到桂华寺原男中校址。女中时，郭宗璠老师任教导主任，教师有雷少根、王仲平、彭燮琼、陈仲模、郑弗名、邓天香、代文钧、吕元宗、杨胜惠、陈守一、魏映池、吴伯尊等，直到一九三九年暑期，乐山被日本轰炸以后，才离开女中校长职务。

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四川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主任座谈会，规定校长与教导主任参加。先生同郭宗璠老师坐船赴渝。在开会期间，他和郭老师专程去政治部第三厅看望阔别二十七年的老同学郭沫若先生。大家多年不见，谈笑叙旧，兴高采烈。郭者还专门在广东酒家设宴招待，同座的有熊克武、但懋辛等。次年春，郭老回乐山探望老父，乐山除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外，先生特别邀请郭老来县女中，对学生作报告，还和叔父杜

道生请郭老写了二副对联，可惜二副对联与家中书籍字画，同毁于“文革”。

(四)倡议开办私立凌云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城外学校、机关、工厂纷纷内迁乐山，人口骤增，要求就学青年有增无已。当时乐山只有三所中学(联中、男中、女中)，招生人数有限，无法满足青年就学的要求，于是先生倡议筹办私立中学。张文苑先生在《乐山市志资料》第一期总02期《凌云中学始末》记有：

“乐山教育界先达杜嵩崇先生约集本地从事教育工作青年、热心教育事业人士等商，拟办一所私立中学，以应抗战急需。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响应，以龚啸风、郭宗璠、陈守一、雷家煦、~~代~~文钧、吴伯尊、杜道生、张文苑、尹尧嵩、吕亢中为发起人，发出通知，邀请地方名流耆宿，于一九三九年春，在草堂寺县小校办筹备大会，到会各界知名人士百余人，大家兴致勃勃，意气很高，一致认为乐山是个大县，各种条件较好，适应时代需要，成立一所私立中学，頗有必要。……”

由于经费、校址都有困难，只好采取临时措施，把男生附设在草堂寺，由县小校长龚啸风兼男生部主任，女生附设在县女中，先生因是女中校长，不能兼任女生部主任，改由陈明玖担任。办学必须有基金，否则教厅不能立案，有人提出乐山炎帝会有房地产，一九三三年，军阀刘文辉要卖官公营庙会产，炎帝会产也在内，地方人士通过杜少裳找刘说情(杜任二十一、四两军机要秘书)，刘答应后，凌中即以炎帝会庙产作基金，才得在教厅备案。一九三九年四月正式开学，招收男女各一班。暑期乐山被日机轰炸，县男中迁关庙乡毛钢厂，县女中迁苏稽乡白衣庵，凌中要找适当地点，很费周折，校长龚啸风建议迁水口。男生部住谢、詹、杨祠堂，女生部住任祠堂。先生交卸女中校长职务后，也随学校到水口教书。凌中在水口办了二年，男女生共十班，约

四百余入，校址容纳不下，先生又提议迁回乐山，住原县男中校址老关帝庙（住男生）和张爷庙（住女生）。

一九四二年，凌中迁回城内，校舍较宽，已办齐初中男女各六班。暑假，先生接任凌中校长，代文钧、章定生先后担任教务主任，王克昌任男生部主任，郭宗璠任女生部主任，帅平均、雷博渊、张文苑、雷天声、胡养卿、雷应涛、魏映池、帅秉常等都在校任课。在此期间，货币急剧贬值，物价上涨，学校经费越感困难。作了二年，一九四四年下期，交卸给龚啸风接办，凌中开始招收高中，先生仍在凌中和省乐中两校任课。

（五）接办武大附中。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八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其时，乐山城区中学因防日机空袭，先后搬到乡区（嘉属联中迁夹江县公场），武大独留城内。由于武大随联工子女甚多，兼之外地内迁的单位也不少，为了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武大教职工自办了一所完中，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设私立珞珈中学”（简称武大附中），校址在铜河塘王爷庙。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武大即迁回武汉，附中学生，本地人数甚多，不能随往。当时武大乐山籍毕业学生唐叔庆、吴正和、欧阳达、杜厚寿、徐平江五人商量，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决定接办这所学校，并请法律系教授蒋思道出任校长，唐叔庆、吴正和、欧阳达、杜厚寿先后分别担任教务、训育、事务工作。一九四六年，武汉大学将全部迁走，校长蒋思道也将随校东下，曾来家会晤先生，准备把附中交地方接办，先生为地方教育事业，也积极赞成。首先要成立校董会，专函邀请杜履谦回乐。（杜当时在西康省政府任职），并邀请地方人士开会，组成“董事会”，改校名为私立乐嘉中学，杜履谦出任董事长，推举帅蕴德任校长，唐叔庆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王克昌任训育主任，杜厚寿任事务主任，帅秉常任初中部主任。由于杜履谦长住雅安，董事长职务，便由父亲代理。为了加强学校领导，校内设常驻董事三人，由先

生和游子久、吴正和担任，主持办学工作。

武大附中，原来校址仅有铜河碥王爷庙，以后班次增多，又租佃九龙巷杨家大院作高中部。武大迁走后，乃将高中部迁到高西门李公祠（原武大理学院，现市人民医院宿舍）。

乐嘉中学开办以来，一直保持了武大附中时代的教学质量和办学风格，声誉卓著。乐山附近各县纷纷送子弟来校读书。直到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接办，才改称乐山第四中学，校地在一九五四年迁到岷江对岸的前乐山技专地址。

解放前的三十多年，先生为了乐山教育事业的发展，怀着“教育救国”的幻想，呕心沥血，实指望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振兴中华，但民国时期的动乱，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四川军阀的混战，地方恶势力的盘踞争斗，却给人民带来灾难。那时的教育，何时不是在艰辛的环境中挣扎呵！然而，先生矢志不渝，孜孜不倦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开始便是借着“教育救国”得以体现的。多年来，他针对传统教育只是服务于少数人的痼疾，极力主张教育普及。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可谓开风气之先，一贯倡导“启发式”，强调对学生要重鼓励，真正做到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百问不烦，所以，学生乐于接近他。直至近年，已届八十高龄的杨若瑜先生还经常来看望他，尊称为“恩师”。

在旧社会，国民党政府，在乐山成立教育会，由各乡教育会选举产生“理事长”。一九四六年，乐山正式成立“参议会”，当时竞争参议员，非常激烈，有的请客，有的送礼，甚至有的“炮选”，先生并未有任何活动，而获票最多，当选为县教育会理事长和县参议会的参议员。

四、教育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也迎来了新生，那时，虽年近花甲，而

精神更为振奋，倍觉年轻，更加努力地献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常说：“现在才真正是人民的时代，现在的教育，才真正是为人民而办的教育。现在能作一个人民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光荣。”他还说“一个教师最大的幸福，在于能够培养人才。”从一九五〇年上期起，便专在乐山一中任教（过去是在乐山几个中学任课）。党的教育，温暖了来自旧社会知识分子献身教育的火热的心。先生在教学上更加勤奋，作业全批全改。党也没有辜负教学多年的老教师，在生活上多方照顾，每次都特别为他作几样软菜，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一九五五年，乐山一中校长赵九如，为他教学四十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当时各校都有教师代表参加，盛况空前，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一代人民教师的关怀。一九五三年，乐山市中区直接选举，担任人民代表，一九五五年春，乐山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先生又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直至一九八三年一直是乐山市政协委员。一九五六年五月，又代表乐山，出席四川省教育工会，当选为理事。一九五六年暑期，乐山地区教育局，推荐先生和张畔青先生去重庆市北碚疗养院休养，直到一九五八年上期，才在乐山一中退休，时年六十七岁。

一九六二年秋，乐山开办草堂民办中学，先生接受欧阳秋校长的邀请，为了发挥余热，不顾年逾古稀，又欣然任教二年。

先生退休后的三十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常接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采访郭老青少年时代的事绩的记者。乐山修志办公室成立后，又被聘请作顾问，他经常向采访人员介绍乐山过去的教育情况和历史文化古迹。先生健谈，每次总在一、二小时以上，家人以他的健康为虑，但他总希望在有生之年把知道的地方情况，介绍出来，留给后代。他先后回忆讲述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乐山教育事业情况的简介》（载乐山市文化资料第一期），《闲谈嘉州往事（一）